

《舒昂党人》的现实主义真实性和倾向性

金 嗣 峰

1828年初,巴尔扎克的经商活动彻底失败了,留给他的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但是,他没有感到沮丧和消沉,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乐观精神,又一次帮助他战胜了灾难性的打击。正如他后来说的,“在我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里,我的勇气总能够克服我的不幸”。

他决意向命运进行新一轮的拼搏,要跻身于最伟大的人物之林,以往他的写作,只是为了稿费,“作品”在社会上受到赞扬或是受到谴责,他是不大放在心上的。从现在起,他发誓要全力以赴地写好每一部小说。

他重新拿起笔来写的第一部小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布列塔尼地区叛乱的历史小说。他一一反以往粗疏的写作习惯,从图书馆里借来许多有关的回忆录和军事报告,进行深入细微的研究,作了许多摘要和卡片。他还象军事指挥员那样,熟读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地图,在脑海里尽可能精确地还原当时双方队伍的行动。这样研究了差不多有两三个月之后,为了把女主人公旅行途中的见闻和感受,描写得真实、生动和感人,他又亲自沿着同一路线,作了一次实地考察旅行。此外,他向一个参加过镇压布列塔尼叛乱的退休将领,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深入采访。

由于他作了十分认真周密的准备,因而一动笔,就写得非常顺手,不久就给出版商送去了长篇小说《舒昂党人》的开始几章。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从来被人认为是写作快手的巴尔扎克,从前写什么虚妄怪诞的爱情小说时,只要说定时间,必定准时交稿,连一天也不耽误,而现在却要不断地催促,还迟迟不将稿子交出来。好容易待到他自己感到满

意了,一当排好版请他看校样时,他又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在校样上涂来改去,把校样改得面目全非,不得不重新排版。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样上大肆涂改,使出版商非常恼火,扬言要在稿费里扣除他的每一次排版费,但巴尔扎克置之不理,仍不紧不慢地按着自己既定的主旨办。

小说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人间喜剧》的处女作的封面上,作家第一次庄严地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小说没有在社会上造成预想中的那样巨大轰动。但这并不减少小说本身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小说不仅标志巴尔扎克摒弃了早年粗鄙庸俗的写作目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决心开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而又崇高的文学事业;而且标志了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纪元的开始,显示了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业绩。

从这部小说开始,巴尔扎克严肃地实践着一种新的创作方法。他执着地追求着人物的真实、环境的真实、语言和细节的真实。这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在《舒昂党人》里,得到了最早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七月革命”前紧张的政治态势,促使年轻的巴尔扎克把自己明确而又单纯的反波旁王朝专制统治的政治倾向,反映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倾向性。由于上述的两个原因,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完美结合,就成了长篇小说《舒昂党人》最主要的特色了。

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799年,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众所周知的。

1794年,资产阶级的“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的激进统治。新成立的督政府,

由于无能和政策的左右摇摆，国内外形势又开始恶化。到1799年9月，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又爆发了反共和政府的暴乱事件，震惊了全国。这是贵族利用农民的落后和愚昧，打着护教的旗号煽动起来的暴乱。正在海外流亡的路易十八和英国首相庇特取得联系后，派出全权代表来领导这次暴乱，力求蔓延全国，为波旁王朝复辟铺平道路，督政府举措不当，几乎成燎原之势。是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对布列塔尼叛乱，采取橄榄枝和大棒一起挥舞的政策，不久，叛乱即被平定。

这就是长篇小说《舒昂党人》的历史依据。作品中涉及的丹东、拿破仑、富歇等人物，都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如共和国将领于洛，警厅密探科朗坦，舒昂党头目土行者等，也都是其生活原型。可见这部小说，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的。但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以及许多场面的情节，都是纯属虚构，所以不能认为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小说反映了众多而又复杂的矛盾，如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政治矛盾，爱情矛盾，共和国一方的高尚正直的将士和猥琐卑劣的密探之间的矛盾，舒昂党一方的争名夺利的头目和领袖的政治企图之间的矛盾，等等。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又被一个高层次的矛盾所影响和制约，即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更深刻的历史冲突，于是，一切都显得条分缕析，清晰可鉴了。巴尔扎克就是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现了自己的倾向性。

我们先来看看共和国战士们的形象。这些共和主义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绝的才智，都是忠贞的爱国者，为了“保卫国家的灵魂、保卫自由、独立的高尚原则和人类的理性”，他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他们把共和国看作亲爱的母亲，认为保卫共和国就是保卫自己的母亲。因此，他们把那些企图恢复封建专制的贵族们，称作是“杀害母亲的凶手”。

在维夫蒂埃尔城堡中，德·韦尔纳小姐对舒昂党头目和共和国军官之间对照比较之后，禁不住以赞美的言语来评价共和国军官了：“一个事实使她十分惊异，两个共和国军官在外貌上给人印象深刻，他们的……前额十分开朗，使他们年轻的脸上带有诚实和高贵的神气……她禁不住要赞美梅尔的仪表堂堂，这个快活的军人……他能够在枪林弹雨中用哨子吹奏一支乐曲……而热拉尔则是威风凛凛。他

严肃而沉着，似乎真正具有共和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法国部队里到处可见，高贵的和隐蔽的自我牺牲精神赋予这个部队以前所未见的精力”。

在作者的笔下，共和国的大队长于洛更是一个杰出的共和主义者，他象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一样”，有着“自己的信念和骄傲”。他的衣着一如士兵，没有披风，终日穿一套衣领破烂的制服，戴着发黑的肩章。作者赞美他是“朝气蓬勃的共和国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他对共和主义有坚定的信念，不仅表现在战场上，毫不留情地打击保皇党人的叛乱，摧毁他们的复辟基础，而且也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政客的腐败和无能的谴责上。他把当时执政的督政府的五位领导人称为“五个老丑怪”。他看到丹东（1759—1794，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后为罗伯斯庇尔处决）和巴拉斯（1755—1829“热月政变”的组织者，督政府的领导人之一）过着腐化生活时，感到极大的愤怒。他说：“我对他们说：‘公民们，共和国请你们来治理国家，不是授权你们重演旧朝代的奢侈淫乐’……如果爱国者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扫清前朝积弊又有什么用？”

这三个共和主义者，当时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里，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但是，他们没有动摇，更没有逃跑，而是决心和敌人周旋到底：“让我们在这里象个忠实的爱国者那样行动吧！尽我们的能力来阻止舒昂党同旺岱来串通一气”。

这三个共和主义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拿破仑的真诚崇拜和颂扬。于洛这样认为：“年轻的拿破仑仿佛是共和国的护守天神，拿破仑抛弃了共和国，共和国就似乎无法抵抗这许多敌人，何况最后出现的敌人，又是最残酷的敌人”。有一次，于洛和热拉尔谈到整个欧洲都在反对法兰西，而“督政府的几位老前辈象马儿在马厩里没有燕麦那样打架”，害得法国各个战场都在吃败仗，谈到这里，老军人不禁深深叹息了：“不幸得很，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将军却在埃及那个鬼地方！”

不仅军官们这样热切地企盼着拿破仑执政，连共和国士兵也是一样。当他们得知，“拿破仑被任命为共和国的第一执政，都高兴得眉开眼笑”。作者深情地写道：“法兰西原来十分崇拜这个年轻将军，现在为着充满希望而战栗起来。整个国家又有生气了”，从此，他的“声音就象预言家的声音一样响彻人间”。

拿破仑作为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的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使他迅速地击退外国侵略

者，平息国内贵族叛乱，保卫了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果实，保住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权益，维护了农民们对小块土地的占有，因此，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仍应予以肯定。法国人民长期对拿破仑崇拜，决不是偶然的。

巴尔扎克为什么在《舒昂党人》中，这样推崇拿破仑呢？我们知道，他甚至在参加保皇党以后，也没有稍稍减轻对拿破仑的敬意。在“七月王朝”时期，他曾引领翘首，急切期望法国能够出现一个工业的波拿巴，来与美吉利抗争。似乎可以说，巴尔扎克在《舒昂党人》中对拿破仑的颂扬，不仅反映了他当时思想中的民主主义成分，而且也显示了他未来的君主主义思想的端倪。

《舒昂党人》中的现实主义描写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还表现在作家通过一系列的细节，反映了封建王朝覆灭的不可避免性。指出国王的事业是无法挽救的。作品写道：路易十八仓惶逃离法国后，许多贵族跟着也纷纷流亡国外，“散布欧洲的宫廷中”，由于种种原因而留在国内的贵族中，有许多人认为“时代已经变了”，就应该顺应已经变了的时代。如“旺岱党新领袖（按，指方丹伯爵，即《苏镇舞会》中的封丹纳伯爵，一个忠诚的老保皇党人）相信必须顺从事态的发展，只在心里保持信仰”。保皇党的“外交官”，“很得亲王们宠信”的拉·比亚迪埃尔，来布列塔尼实地考察后，认为已无必要留在法国作无望的斗争，而“必须回到英国去”。

剩下少数仍顽固不化、坚持与共和政府斗争的是些什么角色呢？作者通过德·韦尔纳小姐的眼睛，对维夫蒂埃尔城堡中贵族，作了一次精细的观察：这些外省的贵族，“都是没有表情和没有生气”，“他们渴望要阴谋，而不是对光荣的爱慕，事实是个人利益真正驱使这些贵族拿起武器”，“他们完全缺少简单朴素和伟大崇高的作风……这都是君主制度没落的象征”。经过反复的观察和比较，德·韦尔纳小姐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她这样称赞共和主义者，“这一边就是国家，这一边就是自由！……这些人依靠他们所统治的现在，去毁灭过去，为的是有利于将来”。再瞅瞅那群贵族的模样后，她禁不住感慨万端了，“这里是独夫、国王、特权……他们蹲在废墟上想拿过去来建设未来”，“希望能使已经死亡的君主制度、被禁止的宗教、流亡的贵族和已被废止的特权，一一复活”。

在圣·詹姆斯舞会上，作家通过德·韦尔纳小姐的眼睛，对那些贵族的卑污灵魂，作了更深入的

观察。舞会前，贵族们争吵得非常厉害，主要是为了争夺爵位、职务、官衔和勋章，他们之中，有的争着少将军衔和男爵爵位，有的想谋求法国河道森林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和大勋章，有的“谦虚地只求得到布列埃尼省长的位置”。他们向国王代表威胁道，假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立即离开王上，去投降波拿巴，这就是说，他们效忠王上，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卑鄙的私心。

问题是在于，这些愚蠢而又自私的贵族，怎么能够在布列塔尼发动大规模的骚乱呢？可以说，这是和布列塔尼的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分不开的。

布列塔尼地处法国西北边远的丘陵地区，与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巴黎距离很远，教育文化的落后，使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革命理想，对它完全不发生影响。这状况一直到十九世纪末，由于运河的开筑，铁路的修建才有所好转。至今，布列塔尼仍是法国经济上比较落后，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地区。

小说一开始就清楚地交代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历史状况和自然条件。

“在整个法国，布列塔尼是高卢的风俗习惯残留最多的省份……还明显地残留着我们强悍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野蛮生活和迷信思想……这里有的是难以相信的凶暴、顽强的固执和对誓言的恪守”。

由于落后，必然带来愚昧，最后必然被宗教所控制所操纵，成为教会反对共和国的工具。作者写道：由于道路泥泞难行，人们之间极少往来，唯一的接触的机会，是在每月一次的宗教活动时。在听了神父的令人害怕的说教之后，他们又回到又潮湿又肮脏的洞穴般的家里去，神父成了这个地区的灵魂，“是这里愚昧心灵的唯一的主人”，“就是在本堂神父的号召之下，千千万万农民向共和国冲击……给舒昂党暴动提供了无数兵士”。在宗教的毒害下，“年轻姑娘们用笑容来引诱蓝军而不认为自己是背信弃义”，而“无知的愚民相信宗教，使他们杀人而不感到良心的责备”。

其次，自然条件也使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军打起仗来得心应手，弥补了他们缺乏严格军事训练的不足。这里的土地遍布洼地、急流、湖泊和沼泽；到处丛生着树篱，“这就是一种土造的城垛，可以使每一块田野变成一个堡垒”，“在这些美丽山谷里鲜花盛开的篱笆内，就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进攻者。每一块田野就是一座碉堡，每一棵树都是化了装的陷阱，每一株老柳树的空洞树干都隐藏一个谋略，

到处都是打仗的地方”。

于是，布列塔尼就成了反动贵族进攻共和国的根据地，布列塔尼农民就成了反动贵族的不竭的士兵来源。

土行者就是受蒙蔽的布列塔尼农民的典型。他身上具有既愚昧无知又冷酷凶猛的特点。复杂的自然条件，养成了他遇水可以潜水深泳，爬坡登山可以象野猫一样灵便的本事。他随身携带的粗大皮鞭，就是杀人的利器，必要时，只消一下，他便可将两个共和战士置于死地。他可以谈笑自若地将“快腿酒鬼”横放在长凳上，然后把他的脑袋切了下来。这一切，使土行者成了共和国凶狠的敌人。他“杀过几百人”。但是，历史不因为土行者之流而倒退。连他们“心灵主人”都办不到的事，土行者之流更是回天乏术了。不过，愚昧和落后可以阻滞历史的前行，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小说主人公蒙托朗的形象。我们知道，《舒昂党人》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创作首篇，带有早期浪漫主义甚至“哥特式小说”的一些痕迹。与作品中其他形象比较，这个形象虽也真实可信，但远不够丰富多采，“英雄”与“美女”的纠葛占了他生活的太多篇幅。或多或少地损害了这个形象的完整性。

蒙托朗是一个可以经常窥见王上的地位显赫的贵族，是布列塔尼叛军的领袖，负责节制舒昂党和旺岱党行动。他在叛乱的贵族中，唯一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信仰上帝和国王，来和共和国打仗的人。来到布列塔尼后，发现形势远较自己想象的严峻，特别是部属的自私与离心离德，士兵的愚昧与可怜军事素质，使他常常在口边露出难以言表的“苦

笑”。但是，他的祖宗的遗训是：“锲而不舍，直至死亡”。王上的倚重，贵族的厚望，以及为了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作了必死的准备。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蒙托朗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情场上，他那么轻率地到富热尔的德·韦尔纳小姐住宅去举行婚礼，特别是得知住宅已被共和国军重重包围时，仍是那样漠然，那样近乎麻木地漠视死亡的威胁，不能不使人认为，他是在用死亡来解脱这难解的尘世烦恼。

蒙托朗是巴尔扎克后来在《人间喜剧》中创造的众多“心爱的贵族”的始作俑者。作家赋予他许多良好的品质，他是叛军中最有才智最有权威的领袖，并且是叛军中最有贵族风度气派的人。他不顾迪·加夫人的劝阻，坚持反对抢劫邮车，理由是舒昂党人的职责是“与共和国作斗争，而不是去劫邮车”。可是，当地的灵魂的主宰、居丹神父却在“教会以前不是赞成过没收新教徒的财产吗？对于否认上帝，摧毁教堂和迫害宗教的革命党人，自然更不用说了”的借口下，公然收下那个抢劫来的份额。

作为贵族阶级中难得的优秀人物，他还断然拒绝了圣·詹姆斯舞会前贵族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与威胁，使他在贵族中间，更显得卓然不群，作者着意渲染他的人品，说什么他的眼睛“显得襟怀坦白”，他的面孔经常流露出“优雅的神色和锐气”，说明他的“生活是以崇高感情作为指针的”，“他有一颗能做出伟大事业”的心灵。

虽然如此，巴尔扎克仍可贵地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写出了这个“心爱的贵族”不配享有更好命运的历史必然趋势。意味深长的是，蒙托朗在临死前留下的遗言，要求他的弟弟“不要拿起武器去反对法兰西”。